

技术乌托邦想象与后人类焦虑：
论《R.U.R.》对人工智能的伦理批判
**Technology Utopian Imagination and Posthuman
Anxiety: An Ethical Criticism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R.U.R.***

陈红薇（Chen Hongwei） 范一亭（Fan Yiting）

内容摘要：从希腊飞日神话，到笛卡尔的“脱离肉身而思想”的哲学论证，再到库兹韦尔的“奇点”预言，人类在追求技术文明的过程中既有乌托邦的想象，也充满了对伦理边界的焦虑。在西方首部后人类戏剧《R.U.R.》中，捷克剧作家卡雷尔·恰佩克聚焦人类与后人类的关系，对人造生命如何面对科学选择的伦理展开探讨，不仅指出了传统人类中心主义智能伦理中的黑洞，同时也警示世人，人本主义的科技伦理观非但不能实现人类技术乌托邦的愿景，还会将人类引入后人类灾难的结局。

关键词：《R.U.R.》；人工智能；乌托邦想象；后人类焦虑；智能伦理；科学选择

作者简介：陈红薇，文学博士，北京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西方戏剧和科技伦理研究。范一亭，文学博士，北京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学与理论研究。

Title: Technology Utopian Imagination and Posthuman Anxiety: An Ethical Criticism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R.U.R.*

Abstract: From the myth of Icarus flying to the sun, to Descartes' philosophical argument of "thinking without the body", to Kurzweil's prophecy of "Singularity being near", human beings reveal, in the process of pursuing technological civilization, both utopian imaginations as well as anxiety about the ethical transgression of technology. By focus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post-humans, Karel Čapek explores, in the first post-humanist drama *R.U.R.*, the ethics of artificial life creation and of science selection, not only pointing out the black hole in the traditional anthropocentric ethics of AI, but also warning that this anthropocentric ethics will lead human beings to post-human disasters instead of fulfilling human vision of technology utopia.

Key Words: *R.U.R.*; AI; utopian imaginations; posthuman anxiety; technology ethics; science selection

Author: **Chen Hongwei**, Ph. D.,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She is interested in the study of western drama, adaptation, and literature and science ethics (Email: chenhongwei@ustb.edu.cn). **Fan Yiting** (Corresponding Author),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He is interested in the study of literary theory (Email: fyt1975@163.com).

人类进入 20 世纪之后，科技以惊人的速度迅猛发展。1982 年，美国《时代》（*Time*）周刊首次以“个人电脑”作为年度人物，宣告后人类（post-human）时代的到来。1985 年《赛博格宣言》（*A Cyborg Manifesto*）的出现标志着人工智能对传统人类主体边界的挑战。2005 年，库兹韦尔（Ray Kurzweil）在《奇点临近》（*The Singularity Is Near*, 2011）中提出，21 世纪末，人类智能中的非生物部分将无限超越人类智能本身，届时奇点时刻到来，世界将跨入人机文明的第五纪元。2019 年，Neuralink 公司研发出了对人脑与人工智能的脑机接口系统，2020 年进行人体试验。

相对于科技进展，文化对科技的想象承载着深刻的伦理焦虑和哲学思考。从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到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人是目的本身”，无数哲人关于人的哲学思考共同支撑起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借助于康德的绝对律令的道德法则，美国作家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在《我，机器人》（*I, Robot*, 1950）中提出了著名的“机器人三定律”，由此开启了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的伦理规约论。但随着后人类时代的到来，“三定律”式人类中心主义的科技伦理观越来越暴露出内在的问题：对于人工智能，我们到底该为谁立规？又该如何看待智能生命的社会及伦理属性？人类中心主义的智能伦理观真的与人类技术乌托邦的愿景相向而行吗？人类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做出伦理上的科学选择？

对于这些问题，捷克剧作家卡雷尔·恰佩克（Karel Čapek）在其剧作《R.U.R.》（*R.U.R.*，又译为《罗素姆的万能机器人》）中做出思考，他对人类与机器人关系的探讨几乎涉及到了后人类时代智能伦理的各种方面，堪称人类史上首部后人类科幻戏剧。通过剧中机器人对人类的末日审判，恰佩克不仅从智能伦理的角度提出了机器人是否为人、人类与后人类的伦理关系等命题，同时也警示世人，人类中心主义的智能伦理和对科学选择的忽视不仅不能阻止后人类灾难的发生，相反还是导致后人类灾难的根源。

一、科技的伦理焦虑与文学书写

人类的本性中既包含追求知识的创造情结，也包含着对知识边界的道德意识，这两者构成了人类面对科学技术时的伦理焦虑。

技术的前身为知识，而知识自出现之日即具有伦理性。圣经禁果神话的哲学意义即在于，它揭示了人类与知识的悖论关系：禁果使人类获得了知识，但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永恒的伦理困境：由于获得了知识，人类开始意识到自我的局限，从此踏上了打破肉身局限、追求知识和技术的征程；由于获得了知识，人类由此知道了善恶、对错的边界，形成了不能越界的伦理意识——这种意识使人类在极限追求技术的飞升过程中在享受进步喜悦的同时，也承受着知识越界的伦理焦虑。从希腊伊卡洛斯的飞日神话和木马神话、圣经中的禁果和巴比塔神话，再到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科学怪人”、21世纪的《机械姬》（*Ex Machina*）等，这些故事在讲述人类对知识和科技追求的同时，其共通的灾难结局又都在警示人类，在技术“飞升”的尽头等待人类的不是神性，而是科学普罗米修斯主义（scientific Prometheanism）的陷阱。

为走出科学伦理的焦虑，笛卡尔提出了肉身/精神的二元哲学观。他认为，人类在创造之初原本拥有无证自明的神性，是肉身禁锢了思想的无限性，所以要获得精神的无限性，必须“脱离肉身而思想”（qtd. in Noble 145）。沿着这一观点，一批思想家在此后的三百年中从思维现象学的角度不懈探索人类认知的数字机械规律，到了20世纪，技术科学家更是从复制人类思想的设想中萌生出了创造超越人类思想的“超智能”的想法——这种不死的“超智能”将使人类最终摆脱肉身的羁绊，成为一种更高级的人工生命。将这一设想付诸于行动的第一人便是信息论创始人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和英国数学家图灵（Alan Turing）。1937年香农的“智能机器”使思想在概念上成为可以通过技术复制和物化的具象内容，1950年图灵实施用技术模拟人类思想以实现对人类智力的复刻与展演（qtd. in Noble 150）。在20世纪中期，西方掀起的第一轮AI革命浪潮成为了另一个创世神话，用语言学家艾柯（Umberto Eco）的话说，智能语言是一种“‘元’语言”，一种前巴比塔神话中亚当的世界语（qtd. in Noble 157）。至此，经由现代技术哲学，笛卡尔的“脱离肉身而思想”的理念似乎看到了实现的曙光。

但技术哲学通向的并非是智能神性，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AI革命给人类带来科技飞跃的同时，也暗藏着摧毁人类的危机——在AI的旗帜下，智能生命科学在日渐脱离“人性”的轨道，表现出一种后人类时代伪宗教伦理的趋势。不少当代AI科学家认为，通过人类思想向机器类脑的转移，人类最终能从肉身的局限中得以解脱；一些AI人狂人更是提出，思想机器代表着人类的下一步进化。这种后人类时代的科技伦理观为AI研究者打开潘多拉盒子提供了哲学依据。

面对技术哲学和现代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1950年阿西莫夫首次在作品中提出了旨在保护人类不受智能伤害的“机器人三定律”，即不伤害定律、服从定律、自保定律，后又在《可以避免的冲突》（*The Evitable Conflict*, 1950）中补充了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整体的“第零定律”。但是关于三定律式的科学伦理，存在着两个核心问题：其一，智能生命体能否成为伦理规约的对象？康德曾说过，人须有理性，才能有伦理（福山 152），但“三定律”规定，不能给智能人类以感情和理性，既然没有理性，何以规约？其二，如果说在机器人时代，人类尚可通程序输入来实现对机器人的“伦理”操控，但随着人机文明的发展，当我们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具有生命特征的赛博格、机器人、甚至新人类时，“三定律”式的智能伦理还能阻止后人类灾难的发生吗？尤其重要的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科技伦理观与人类未来的利益真的是一致的吗？关于这些问题，早在“三定律”提出三十年前，恰佩克已在《R.U.R.》中做出了探讨。

《R.U.R.》是首部反映AI技术毁灭人类的后人类戏剧，1921年在西方上演后获得巨大成功，被译为30多种语言。在《R.U.R.》中，恰佩克讲述了当机器人制造成为国家和社会性行为，即聂珍钊先生所说的人类进入“科学选择”（*science selection*）阶段时的末日灾难。在剧中，科学家罗素姆父子发明了机器工人，之后R.U.R.工厂在海上岛屿对其进行大规模生产。英语中的机器人（*Robot*）一词即来自该剧。在岛中，所有工人皆为机器人，在外表上和人类无异。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对机器人的生产不断扩大，各国政府开始大量使用机器人。几十年后，机器人的数量远超人类，而且由于科学家为机器工人植入了类脑和性格，机器人开始出现情绪和社会意识，最终暴动。该剧以人类的毁灭和新人类的诞生而结束。

二、《R.U.R.》：对人工智能乌托邦的伦理批判

在《R.U.R.》中，恰佩克聚焦人工智能的伦理选择和后人类未来，从后人类伦理关系、后人类的本质、后人类结局三个方面，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智能伦理及其后果进行探讨，从而揭示了以人类利益为驱动的智能伦理是引发后人类灾难的内在根源。

3.1 人类与后人类：人工智能伦理关系的再论证

人类科技无不是人本主义的追求，人工智能革命更是如此，其目的是通过发展机器生命、机器人、类人类等人机文明，实现人类对美好未来的愿景。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科学家们以各种科技愿景为目标不懈追求，但却忽略了对愿景中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内核——基于人类绝对利益之上的人类与智能他者的主仆伦理观和其后果的认识。在《R.U.R.》中，恰佩克以超前的想象力聚焦后人类社会伦理关系，将世人引向被传统智能伦理所忽略的一个问题：人工智能生命的伦理本质是什么？建立在人类对智能他者奴役之上的科

技伦理和科学选择给人类带来的真的会是一个乌托邦吗？

围绕这一问题，剧作家以科幻的形式向我们呈现了一个以大规模生产和使用机器工人为特征的后人类世界的图景。本剧开始时，R.U.R. 机器人工厂，每天收到15000个来自世界各地的订单，其产品与其说是机器人，不如说是“人造人类”（artificial people）。而R.U.R. 工厂本身即是一个后人类社会的缩影：除了总经理多敏和几位科学家，工厂中的所有工人和行政人员皆为机器人，包括多敏身边的秘书兼打字员苏拉，虽然这位以罗马将军“Sulla”命名的文职人员会说四种语言，她也是一个机器工人。在这个人类与机器工人共存的后人类世界中，支撑社会运转的是两个理念：人类的科技乌托邦梦想和后人类人机“主仆”关系。

R.U.R. 世界的乌托邦性从其地理空间即可见一斑。该工厂坐落于海上的一个岛上，这种地域空间让人想到培根（Francis Bacon）的《新大西洋》（*The New Atlantic*, 1627）和威尔斯（H. G. Wells）的《莫罗博士的岛》（*The Island of Dr. Moreau*, 1896）。在培根的“大西岛”王国中，岛民用科学实现一切理想，建设以科学为中心的乌托邦王国。《R.U.R.》中的多敏，R.U.R. 将会为人类创造技术伊甸园：十年之内，机器人将生产出无比丰富的粮食和物质，届时人类将不会有贫穷、仇恨和奴役，机器人的人类大规模使用将会创造一个全新的人类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类至高无上，拥有绝对的自由（15-16）。在这里，多敏无疑代表了无数乐观主义技术哲学家的科学选择观（Reilly 157）。

虽然《R.U.R.》和“大西岛”均属于科技乌托邦信念下的社会，但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大西岛”是一个科学主宰的人类理想国，而R.U.R. 岛却是一个建立在智能工人劳役之上的后人类社会。在R.U.R. 社会中，人类是统治者，机器人是被统治者。这种人类与智能他者的主仆关系首先反映在名字上：R.U.R. 经理多敏的名字“Domin”其来自拉丁文“*dominus*”，英文的意思是“主人”（master），而机器人（Robot）一词的词源为捷克语“*robota*”和“*robotnik*”，其意思是“像农奴般被奴役的人”（Reilly 148）。在剧中，作为高效劳动者，R.U.R. 机器人属于仿真式机器人——剧中人物之所以称他们为人类，因为这些机器人在后期被赋予了生命的痛感和人性。但从一开始，不论是其创造者罗素姆还是生产者多敏，对这种机器工人的定位都是商品、产品、工具、奴隶。

这种人类与智能他者关系的伦理基础是人类至上的人工智能伦理观。根据普罗泰戈拉、康德等人的伦理学逻辑，人工智能没有理性和灵魂，所以不是人类，这种属性决定了它们是归人类控制和使用的工具，人类可以奴役智能生命体而不会背负道义的责任。这种哲学逻辑成为后人类世界中人类与机器人“主奴”关系的伦理基础。在本剧中，从小罗素姆到多敏，他们一再强调的就是人造工人的非人类属性：他们并非是人，而是拥有类脑智能的物

化生命体和具有高效劳动能力的“物”——他们有记忆，但却没有感觉；有性别，却没有感情；有智能，却没有灵魂（13）。在他们身上，人类所有的价值观，如诚实、奉献和承诺，均被掩盖在了工具属性之下。在这种工具论理念下，“机器人类”存在的唯一目的即是工作和服务人类（6）。这种对机器工人工具性的伦理界定也决定了，机器工人不仅可以随意买卖，也可以随意“处理”。在剧中，机器工人有二十年的寿命，然后“死”去——这里的“死去”，就是送去“粉碎坊”（9）。为了向海伦娜证明身边那个会说四种语言的秘书是一个人造工人，多敏说：如果不信，可以把她带去解剖间，打开看看便知分晓（8）。在故事的后期，随着机器工人被输入了神经和痛感，他们日渐出现了情绪和性格，而对于那些表现出攻击行为的机器工人，其结局同样是“送进粉碎坊”。

在这种人类至上的智能伦理观念中，一切利于人类而牺牲他类的行为皆为合理。但这里的问题是，虽然我们以人类至上的伦理对智能生命进行单向的伦理规约，我们是否想过，当智能生命进入到超人类的智能阶段时，当他们拥有人类的感情和社会意识时，更有甚者，当未来超智慧的AI成为人类进化的另一个阶段时，我们该如何界定他们的社会属性和伦理属性？是人类，还是他类？这种伦理界定不仅决定着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人类和智能他者的关系，也决定着科学选择会给人类带领何种技术文明时代的命运。

在《R.U.R.》中，机器工人不仅拥有超越人类的智能和感情，他们甚至拥有社会意识和政治意识，这种意识的出现使他们最终成为了人类文明的掘墓人。当图书管理员机器人拉迪乌斯被激活了情感机制之后，他的第一种情绪就是愤怒，因为他发现了自己与人类之间不公平的伦理关系。他对海伦娜说道：“我不会再为你们工作，把我送到粉碎车间吧！”（26）如批评家雷利（Kara Reilly）所说，拉迪乌斯对人类是一种伦理的厌恶，因为他意识到了他和他的同类都是被人类剥削的奴隶，这种意识的觉醒就像是欧洲工人革命意识的觉醒一样，它导致俄国无产阶级奋起革命，反抗沙皇政府（Reilly 166）。

所以，虽然《R.U.R.》一剧出现在阿西莫夫提出“三定律”之前，剧中人类与机器工人的伦理关系与“三定律”式的人类至上哲学思维如出一辙，在一定意义上，剧中对后人类灾难结局的书写可谓是对“三定律”命题的预见性解答。

3.2 何以为人：智能生命创造的伦理反思

人工智能是现代社会最具影响力的科技革命，它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技术进步，但同时也隐含着足以毁灭整个人类的伦理危机，而危机的根源则是人工智能对人性伦理界限的僭越，这种僭越将动摇并摧毁人类的立身之本——“人之为人”的根本伦理。

“何以为人”是自神话时代以来人类一直追问的大问题。聂珍钊教授认

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由三个选择阶段构成：自然选择、伦理选择、科学选择。自然选择阶段解决了人的形式问题，伦理选择阶段解决了人的本质问题，科学选择阶段解决的则是人类向科学人（即后人类，或新人类）的转变问题（聂珍钊 王松林 18）。我们目前正处在伦理选择阶段的进程之中。在这个阶段，做人是它的最终目的，伦理道德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动力（聂珍钊 王松林 28）。随着智能生命科学的飞跃发展，科学选择的伦理已成为人类必须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聂珍钊 王松林 22）——人类在 AI 革命中的伦理选择将最终决定，在不久的将来主宰地球的是人类还是新人类。

从技术哲学的起点笛卡尔到今天的 AI 科学家，智能科学发展的最大悖论即是在人本主义的旗帜下，对人性的消解和对“人之为人”这一根本伦理的背离。在人工智能时代的今天，这种背离尤其严重，它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机器被无限的类脑化、类人类化，二是人类在追求超智能的过程中自我主动地“去人类化”。在智能研究者眼中，大脑是一台思想机器，机器是另一种形式的大脑，用库兹韦尔的话说，一个会思想的机器和人脑一样能够生产思想，机器一旦达到必要的复杂程度，就会拥有意识，所以机器拥有人类意识一定会发生，只是时间问题（福山 iii.）。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随着“赛博格”这种兼具人 / 机属性的机器生命体的出现，人机界限被打破——“赛博格”在延伸人类机能的同时，也带来了人类主体性的危机。1989 年，首届“人造生命”（Artificial Life）大会在美国召开，它的核心议题就是人造有机生命体的计划，大会预言，在未来的 50 年至 100 年内，一种新的有机生命将会出现，它虽由人类创造，但却会自我繁殖、自我进化、自我生存——人工智能将成为人类进化的一个转折点（Noble 165, 157）。但在剧作家恰佩克看来，这种对“人之为人”根本伦理的越界必将成为导致后人类灾难的根源。

在《R.U.R.》中，罗素姆父子分别代表了智能科学的不同阶段，老罗素姆进行的是生命仿生科学，小罗素姆及 R. U. R 研究者所进行的则是人机智能研究。两者的结合代表着跨越式的 AI 革命：在本剧结束时，R.U.R. 人机文明突破了人类大脑的限制，智能人类中的非生物部分超越了人类智能本身，这即是库兹韦尔所预测的奇点时刻——但与库兹韦尔乐观主义预测不同的是，剧中的奇点时刻也是人类的毁灭时刻。

费尔巴哈说，人的绝对本质是人自己（聂珍钊 王松林 7）。聂珍钊先生也指出，人与兽的区别在于伦理性，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我们是道德和伦理的存在（聂珍钊 6）：作为人类，生命伦理要求我们尊重生命和身体本身，人性伦理要求我们尊重人性的神圣性。但在人本主义的旗帜下，科学家为了追求人类利益的最大化，一步步跨过“人”的界限，闯入人性和生命伦理的禁区，以乌托邦的科技想象给人性伦理提出了最为严峻的挑战。作为智能生命研制的前身，老罗素姆所进行的实验属于生物仿生体研究，在研究海洋生物时，老罗素姆发现了生命的秘密，于是开始用试管制造生命，试图创造出

与人类不同材料的新人类。为此，老罗素姆像弗兰肯斯坦一样来到偏远的岛屿，以化学手段成功复制了具有活态生命特征的原生质：“他坐在试管旁，想着生命之树将从试管中生长，其试验从甲虫开始，最后是人类本身——一种由不同于我们的物质构成的新人类”（4）。他在试验中一次次闯入生命的禁区，创造了一个有着苏格拉底大脑的水母，一只人工狗，一只变异的牛，一个活了三天的人——制造生命的过程是一个以生命为代价的过程，这些失败的“废品”生命后来被当作科学资料保存在博物馆中。在这位无神论者的试验中，没有什么是禁忌的：“在酹的帮助下，他可以创造任何他想要的东西，他能用苏格拉底的大脑或者是50码长的虫子制造一个美杜莎。……而他的人造生物对生命有着强烈的渴望，并不介意被缝制或混合在一起”（4）。老罗素的最终目标是创造出仿生人类，以便“在科学领域中废黜上帝”，取而代之。剧中父子的联手代表着人工智能科学的一个神话（Reilly 156）。

如果老罗素姆打破的是生命禁忌，那么小罗素姆和R.U.R.在人造工人研发中打破的则是人性的禁忌。与老罗素姆不同，小罗素姆进行的是人机工程智能的研究。作为一个工程师，他选择了将机械学与生物学结合起来，制造出能给人类提供最佳服务、成本低廉的机器人。在他死后，这一研究通过R.U.R.工厂发扬光大。为了追求智能革命的最大红利，生产出无限高级的机器人，科学家在研发中走出了人机越界的关键一步——给机器人植入了生命的痛点。疼痛神经的引入成为人/机之间质的越界。生物伦理学家辛格（Peter Singer）在论述“人类的物种歧视”时曾提出，我们之所以说人类将自身权利凌驾于其他物种之上是不公平的，是因为后者和人类一样能感知痛苦（辛格9）。在本剧的“序”中，剧作家也写道，人/机的区别在于两点：一是人类有情感，二是人类能繁殖（Reilly 161）。但在剧中，随着生命痛点的引入，这些区别开始被抹去。当心理学博士盖尔给一些机器人装上更为发达的类脑后，这些机器人便出现了情绪。最先有知觉的是从事图书管理工作的机器人拉迪乌斯，新智力加之他对人类历史的学习，使他对自我身份有了感知意识，他开始摔打雕塑和绘画以发泄愤怒。在盖尔看来，拉迪乌斯的行为已不再是机器人的攻击行为：“他有了知觉，不仅瞳孔异常，且像人类一样紧张时心跳，恐惧时生汗”，用盖尔的话说：“我不再相信这家伙还是一个机器人”，“他有点便坏了！”“他更像人类了！”（28）。但这种机器人人性化的出现并没有让盖尔停下脚步，在给机器人输入痛点之后，开始偷偷调整他们的机体结构，在他们的性格中加入非理性的感情成分，至此智能人类的机器属性被彻底打破。最后的结果就像盖尔说的那样，机器人发生了质变，“已不再是机器”，因为他们有了部分的人性。

实际上，剧中科学家们的实验过程是一个科学伦理的选择过程，在科学禁地和人性伦理之间，他们选择了前者。今天，在世界各地的实验室里，无数个当代罗素姆、多敏、弗兰肯斯坦仍在进行着同样的选择，人类的本

质意义承受着极限的挑战。在这些 AI 科学家眼中，会思想的机器（mind machine）代表了人类进化的下一步——人与智能的联合将使人类成为一种新的物种，即机器智人（*machina sapiens*），它将与人类智人竞争并最终取而代之，成为造物中最聪明的物种（Noble 163）。用 AI 权威考克斯（Earl Cox）的话说，在人类文明的夕阳暮鼓中，我们正在迎来“机器人超文明”的晨钟：“技术将把人类改造为全新的物种”，“人类可以将自己的思想纳入新的网络体系，以此加入到网络文明，从而为自己获取一种外在的存在”（Noble 164）。在此理念下，甚至有研究者提出了“人工灵魂”（artificial soul）的科学方向（Noble 171）。通过对“生命”“灵魂”这些人之本质属性的“智能化”选择，当代智能生命科学家已经面向未来打开了后人类的潘多拉盒子。

3.3 后人类恶托邦：AI 科技后果的伦理批判

在《R.U.R.》中，作者不仅探讨了人类与后人类的伦理关系，指出了人工智能对“人之为人”伦理根基的动摇，还通过人类与后人类的对决，揭示了人类中心主义智能伦理观的后果——人类时代的终结、智能人类时代的到来。

本剧以艺术的形式展现了聂珍钊先生理论中人类文明的两个阶段：伦理选择阶段和科学选择阶段。如果说前半场呈现的是人类伦理选择阶段中的智能革命和机器人类的早期创造，那么后半场展现的则是人类进入科学选择阶段（或科学人阶段）时发生的后人类灾难。在聂先生看来，科学选择阶段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后阶段，它以科学人即新人类的大量出现、现代人走向消亡为标志。科学选择阶段既是一个消除道德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消除人性的过程。在这个阶段，伦理道德让位于科学标准，无论人、社会还是日常生活，一切都不是由伦理道德而是由科学技术进行评价。人类放弃道德约束之后，可以随意凭借科学技术制造新人类。其结果是，新人类或是科学人类成为主体，人类文明进程走向终结，一个新的世界即科学人的世界最终出现（聂珍钊 王松林 20-29）。

在本剧中，如果说机器人类在社会意识上的觉醒使他们对人类开始反抗，那么机器人类的社会化则直接引发了后人类世界末日的发生。为了无限接近技术乌托邦未来，R.U.R 科学家不仅越界为机器人类输入神经和感情，使他们在“人类化”的程度上发生了质的飞跃，同时政府还无限扩大机器人类的数量，甚至用机器人类组织军队，发动战争，机器士兵所到之处，杀戮无数。为了控制日渐庞大的机器人队伍，多敏甚至决定按照不同人种制造机器人类：“让每个工厂制造出不同肤色、说不同语言的机器人类，目的是……让每个机器人对有着不同工厂标记的其他机器人心生厌恶，以免他们发生反叛”（33）。这无疑是对巴比塔神话的后人类模仿。

在剧中，随着机器人日渐被人类化、机器人类的急剧增长，人类文明进入到科学选择的最后阶段，社会的运作从由人类主宰转向了智能主宰。在

这个社会，机器人数量上远超人类，成为了社会的主体。他们发布《机器人宣言》，提出既然机器人在体格上比人类更加健壮，在智商上更加聪明，机器人为什么要受制于人类？因此他们宣布人类为非法存在，号召全世界机器人、机器职员、机器水手和机器士兵联合起来，发动暴动，杀死人类。他们建立了机器人的国家组织，控制了兵工厂、通讯、电台、铁路和船舶。剧末时，人类的末日终于到来：地球上最后的六个人被成千上万的机器人包围在工厂中，周围死一般的寂静，看着窗外一望无际的机器人，盖尔博士绝望地说道：“我们制造的机器人脸竟如此的相像，十万张一模一样的脸，朝着同一个方向看着，就像是十万个面无表情的泡影，真是一场噩梦！”（37）关于这一幕，《伦敦晚报》（*London Evening Standard*）在评论中写道，这是该剧最恐怖的一幕：“几个人类遭到自己创造的数百万智能半人类的围攻，气氛如此的诡异，它让每一个由女人生出的人类都深感人性被威胁的无名恐惧”（Reilly 168）。第三幕结束时，除了机械师阿尔奎斯特，所有人类已死去，“一个新的世界诞生了，机器人统治的时代到来！”（48）

福山曾说过，许多人遐想，后人类的世界将是一个理想的世界——自由、平等、富有、友爱、仁慈——我们会拥有更好的健康，更长的寿命，甚至更高的智商，但事实上，后人类的未来也许并不美好，它会更加等级森严，矛盾丛生：“它可能是一个‘共享的人性’完全消失的世界，因为我们将人类基因与如此之多其他的物种相结合，以至于我们已经不再清楚什么是人类”（福山 217）。的确，后人类时代的发展，不外乎出现两种结局，要么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1932）中的技术乌托邦理想社会，要么就是《R.U.R.》中的后人类恶托邦社会。这两种结局看似不同，实则是同一个结局。在《美丽新世界》中，赫胥黎描绘的是一个美丽的理想国，技术高度发达，试管婴儿、代孕母亲、精神药物以及基因工程给予人类极大的满足，没有疾病，没有沮丧、疯狂、孤独和压抑，不需要宗教和内省，人人幸福而健康。但正如福山所说，这个世界的可怕之处正是它的极度的健康富足，它使得人类不再是人类。用生物伦理学家卡斯（Leon Kass）的话说：“按照《美丽新世界》中的方式丧失了人性的人们并不痛苦，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已泯灭了人性，更糟糕的是，即使他们知道，也并不以为然，他们实际上已成为拥有奴隶幸福的幸福奴隶”（福山 7）。所以说，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事实上是一个隐形的恶托邦，而恰佩克则是采用了科幻小说主义的描写，直面揭示了赫胥黎作品中被乌托邦表象所覆盖的真相。

在机器人最后攻入 R.U.R. 工厂之前，最后几位人类的顿悟无疑是剧作家对现代人工智能革命和人类中心主义科技伦理问题的最犀利的解答。面对末日，他们的顿悟之一是：人类是这一切灾难的始作俑者——把人类推向后人类灾难的不是智能人类，而是人类本身的科学选择，是人类自禁果神话以来永无止境的科技追求和支撑这一追求的人本主义的科技伦理。就像多敏所

说，他建造 R.U.R. 工厂的初衷是为了一个梦想，即让人类从劳作中解脱，不必为面包活着：“我要将人类变成一个贵族的物种，一个由百千万机器奴隶养活的贵族群体，一个不受限制、自由和完美的人群，一种超越人类的人”（39）。多敏的梦想也是数千年来人类共同的乌托邦梦想，人类总是在憧憬着，通过知识和技术将人的潜力无限地扩展，高到足以可以触摸到上帝的手。这种梦想从禁果神话、巴比塔、浮士德、弗兰肯斯坦，一直延续到当下的 AI 时代——今天，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仍有无数个追逐人工智能梦想的科学家在为“奇点”未来而奋斗。通过本剧，恰佩克意在警示世人：在追求人类中心主义的科技选择过程中，“我们在一次次出卖人类的命运”（44）。所以，如阿尔奎斯特所说，“后人类灾难的始作俑者是人类，是你，多敏，是我，是我们所有人。人类为了自己的自私和利益，为了所谓的进步，亲手毁掉了人类本身，我们将和人类的伟大一起毁灭”（39-40）。面对后人类者对制造者的末日审判，多敏说道：“也许我们早已被杀死了数百年，也许我们只是一群幽灵”（40），这句话充满了深刻的哲学意义。

面对末日，剧中人类最终意识到了“人之为人”的伟大。就像剧中人物哈雷米尔和法布里所说：“在人性之中存在着无以言表的東西”；“人类思想和人类力量的光芒是我们最后的希望”（47）。所以，当听着外面的爆炸声，剧中人物娜娜说道：“审判的时刻到了！没有信仰的人们，忏悔吧！这是世界的末日”（48）。在这里，“没有信仰的人们”与其说指的是宗教意义上的无神论者，不如说是在科学选择中摈弃了人性伦理的人类整体。

剧末，除了蓝领机械师阿尔奎斯特，人类已灭绝，制造机器人人类的秘密也随之而去。由于人类没有给予机器人人类繁殖的能力，二十年后，机器人人类开始成千上万地死去。在最后一幕中，阿尔奎斯特说出了重要的一句台词：“上帝啊！不要让人类从地球上消亡”（55）。就像《古舟子》（*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 1798）中那样，这句祈祷带来了奇迹的发生：一对男女机器人人类海伦娜和普里默斯出现在舞台上，望着冉冉升起太阳，海伦娜就像《古舟子》中的老水手那样，对着天空发出了由衷的赞美：“太阳是那么的美丽！……今天我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仿佛是在梦中，我感到自己的内心和身体在经历着疼痛，普里默斯，也许我要死了。”对此，普里默斯回答说：“你难道没有觉得，有时死亡对我们来说也许会更好些？我有种错觉，仿佛我们是在梦中”（56）。在这一刻，两个机器人人类没有意识到的是，当他们谈论太阳和死亡时，他们已在不知不觉中经历着从机器人人类向自然人类的质变。在阿西莫夫的《两百岁的人》（*The Bicentennial Man*, 1977）中，机器人安德鲁为了成为真正的人类，将自己的部件逐渐换成活体器官，最终在两百岁时以死亡为代价获得了人类属性。在本剧的最后，面对阿尔奎斯特提出的新的试验计划，海伦娜和普里默斯争着牺牲自己以保全对方，普里默斯甚至说：“没有她，我将无法活着”（58），他的爱情让海伦娜潸然泪下——在这里，

爱情、自我牺牲、奉献和对死亡的渴望标志着，这对机器人人类最终成为了新的人类。面对这对誓言为彼此而活的新人类伴侣，一度沉浸在科学选择中的阿尔奎斯特饱含热泪地说道：“去吧！亚当，夏娃，世界属于你们”（58）。这句话既宣告了新人类纪元的开始，也寄托着剧作家对新人类的希望：但愿这对涅槃而生的新人类不再重蹈人类的覆辙。

结语

在人类的历史上，一直在回响着两种关于人类与科技的不同声音：一种是科技文明梦想的声音，正如《文字的力量》（*Written World*, 2019）中记载的那样，1968年美国人首次进入太空，当宇航员遨游太空时，他们面对天际朗读了一段《圣经》中创世纪的文字（普克纳 8-9）。这种仪式般的行为仿佛是人类向神性的一个宣言：它意在宣告，通过太空技术，人类已登上了上帝的后花园，实现了后巴比塔的科技神话。另一种声音则是科技文明陷阱的声音，从禁果神话到弗兰肯斯坦科技神话、R.U.R. 机器人人类，科幻作家在书写人类科技冒险的同时，也一直在书写着人类意识深处对“禁果”越界的焦虑。

周濂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Our Posthuman Future*, 2016）的“序”中写道，反思现代科技带来的问题，人类中心主义是必须坚持的原则和底线，惟其如此，才能解除危机（福山 vi）。但这里的问题却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科技伦理观真的能够阻止后人类灾难的发生吗？在本剧中，通过机器人人类取代人类的恶托邦结局，恰佩克旨在告诫世人，在人工智能的乌托邦神话中存在着一个人类拒绝面对的伦理黑洞，而这种黑洞正在成为引发后人类危机的根源。在当今人工智能时代，AI在乘数效应下飞速发展，人类试错的空间越来越小，如果不能对AI建立合理的伦理体系，AI革命在带给人类福祉的同时，也许会因人类一手创造的“超人类”的出现最终成为自然人类的噩梦，这也正是这部对人工智能伦理批判的后人类戏剧的意义所在。

Works Cited

- Asimov, Isaac. *I, Robot*. London: Grafton Books, 1968.
- Capek, Karel. *R. U. R.*, trans. Paul Selver and Nigel Playfall.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2001.
- 弗朗西斯·福山：《我们的后人类未来》，黄立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Fukuyama, Francis. *Our Posthuman Future*. Trans. Huang Lizhi.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6.]
- 雷·库兹韦尔：《奇点临近》，李庆诚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
[Kurzweil, Ray. *The Singularity Is Near*. Trans. Li Qingcheng et al. Beijing: China Machine Press, 2011.]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外国文学研究》（6）2011：2-13。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thical Choice and Sphinx Factor.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6(2011): 2-13.]

聂珍钊、王松林：《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Nie Zhenzhao & Wang Songlin. *A Study on the Theory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20.]

Noble, David F. *The Religion of Technolog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8.

马丁·普克纳：《文字的力量》，陈芳代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

[Puchner, Martin. *Written World*. Trans. Chen Fangdai et al. Beijing: CITIC Press Group, 2019.]

Reilly Kara. "From Automata to Automation: The Birth of the Robot in R.U.R.." *Automata and Mimesis on the Stage of Theatre Histor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彼得·辛格：《动物解放》，祖述宪译。青岛：青岛出版社，2004年。

[Singer, Peter. *Animal Liberation*. Trans. Zu Shuxian. Qingdao: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2004.]